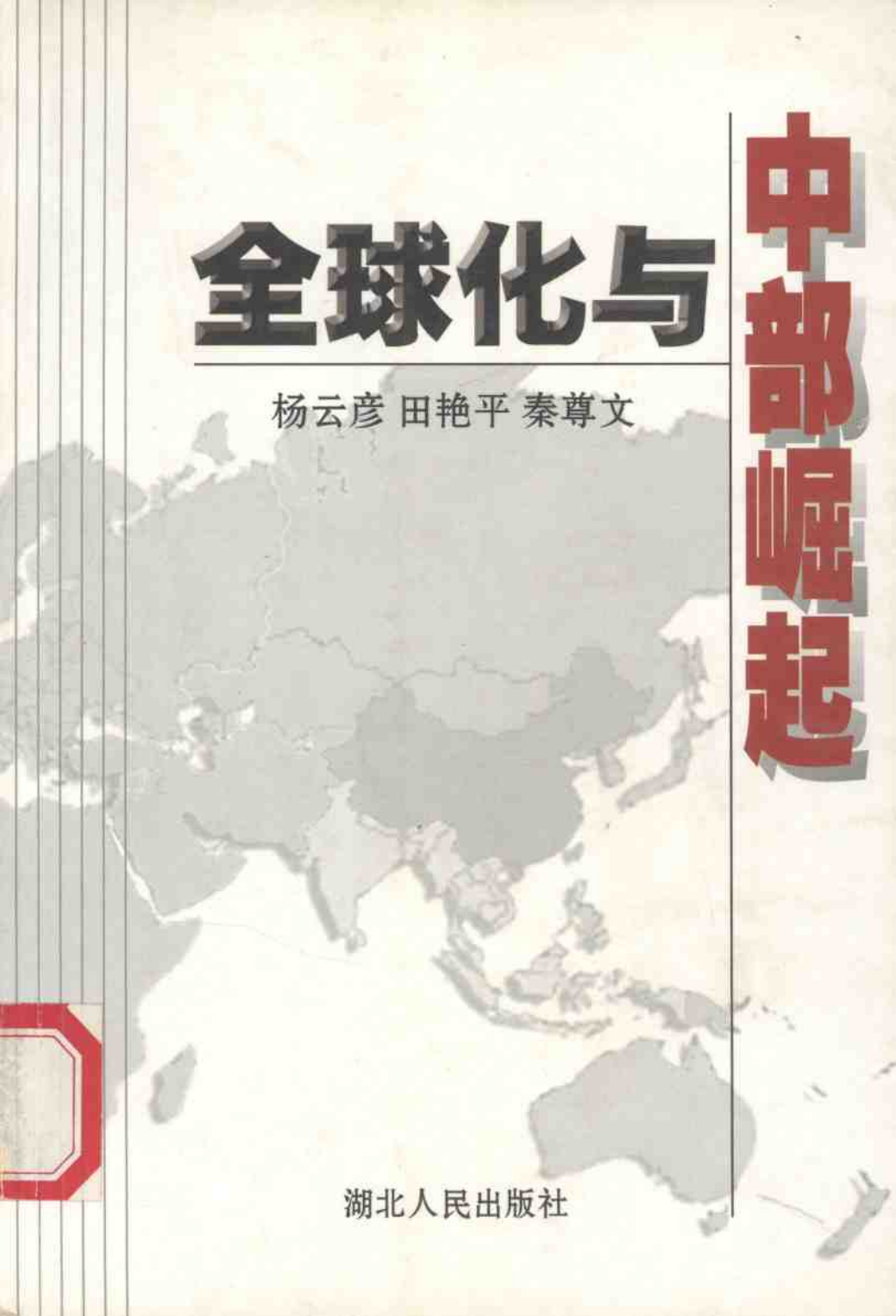


全球化与



杨云彦 田艳平 秦尊文

中部崛起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全球化与



中部崛起

杨云彦 田艳平 秦尊文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中部崛起/杨云彦,田艳平,秦尊文.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3

ISBN 7-216-04212-3

I. 全…

II. ①杨…②田…③秦…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4468 号

全球化与中部崛起

杨云彦 田艳平 秦尊文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 毫米×1068 毫米 1/32
字数:218 千字
版次: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定价:26.00 元
书号:ISBN 7-216-04212-3/F·759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8.75
插页:4
印次: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一、导言	1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部地区的边缘化	5
2.1 中部塌陷的现实	5
2.2 经济全球化与 FDI	15
2.3 FDI 在我国的地地区分布	21
2.4 FDI 在我国的产业分布	26
2.5 产业替代与就业替代	29
2.6 中部地区的边缘化	36
三、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动态过程	44
3.1 区域经济增长	44
3.2 新古典增长模型	46
3.3 区域经济增长的扩散与转移	56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区域增长模式	61
4.1 区域发展的新背景	61
4.2 传统区域增长模式	65
4.3 新区域增长模式的基本特征	69
4.4 新经济与区域创新机制	75
4.5 新区域增长模式	77
五、我国地区发展与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82
5.1 计划经济下的均衡发展战略	83
5.2 沿海开放与梯度开发	87
5.3 西部大开发——新均衡战略	90
5.4 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	94
5.5 中部崛起战略的形成	95
六、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与发展机遇	101
6.1 中部地区综合优势分析	101
6.2 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系统	118
6.3 科学发展观与中部崛起的政策机遇	128
6.4 新区域增长与地区发展拐点	129
七、新增长阶段中部地区的战略作用及其定位	133
7.1 经济增长方式变化与中部地区的战略作用	134
7.2 主要增长区域的竞争与合作	143
7.3 中部地区的发展定位	155

八、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与思路·····	161
8.1 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 ·····	162
8.2 大产业战略 ·····	167
8.3 大市场战略 ·····	174
8.4 大网络战略 ·····	175
8.5 以武汉为龙头的中部城市经济圈建设 ·····	177
九、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撑体系与对策建议 ·····	211
9.1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政策 ·····	211
9.2 自主增长能力的培育 ·····	230
9.3 政策支撑体系的构建 ·····	245
十、结论·····	260
后记·····	265
参考文献·····	266

一、导 言

中部地区，物产丰饶，人文厚重，承东启西，得中独厚。“湖广熟，天下足”，“九省通衢”，是中部地区的真实写照。建国以来，中部地区曾经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中部地区具备了经济发展的众多有利条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技术人才等，经济建设也有过持续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也不断地有过中部崛起的冲动，但区域经济发展，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部地区特别是以湖北、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为代表的省份，近年来经济地位持续下降，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为什么中部地区在不断的躁动之中一天天消退？为什么中部地区具备了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资源、区位、基础、人才，还会一天天塌陷？

对中部塌陷的成因，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中部塌陷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体系中的边缘化。受历史影响，中部地区一般是上缴利税大户，为国家财政积累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近年来享受国家支持有限，特别是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中，相对于这些地区享受的优惠待遇，中部地区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享受到和沿海地区同等的政策待遇。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政策说”。

一种观点认为，体制原因，是中部塌陷的主要原因。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经济不发达，经济主体活力不强，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增长的动力，市场化不足也是体制发育不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类观点可以概括为“体制说”。

一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是影响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原因。中部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区，资源类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也有很大比重，这些行业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受到管制较多的基础性行业和部门，不合理的比价关系，使得这些地区在经济合作与地区分工中处于不利位置，饱受批评的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不合理分工结构和比价关系所致。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结构说”。

还有观点从历史文化传统上剖析中部塌陷的成因，认为中部地区存在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等小农文化理念，如“码头文化”的短期行为特征、不重诚信的社会文化环境、“醒得早、起得迟”的工作作风等的深刻反思，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文化说”。

以上四类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部塌陷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常强的政策意义：按照“政策说”的逻辑，既然中部塌陷是政策扶持不足所引起的，那么中部崛起也必然要求国家予以政策的扶持。“体制说”则要求我们通过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健全市场机制，培育市场经济主体，增强经济自主增长能力来实现中部崛起。“结构说”要求我们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提升自身竞争力。“文化说”要求我们继承中原文化传统的精华内涵，树立讲信用、讲合作、讲竞争的文化氛围。

但是，以上观点，尚不足以解释在一个开放经济环境下的地区发展过程。如果我们把中部塌陷的现实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就可以发现，中部塌陷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全球化是一张日臻细密的网，于无形中，已经将我们纳入到世界经济的整

体，有如全球气候系统的“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太平洋某个细微角落轻轻扇动翅膀所激起的微小气流变动，经过不断的传导放大，可能在大西洋激起滔天风暴。中部地区的塌陷，正是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条件下被不断边缘化的结果。

所谓边缘化，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某些部门、产业或区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断下滑的过程，随着其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下降，和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削弱，其在经济组织中的相对位置就从中心逐步被排挤到外围。边缘化的例子可以找到很多，交通方式的变化，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技术进步和资源的枯竭，使得原有的经济优势丧失，而新的竞争优势没有建立起来，这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边缘化案例，古代“四大名镇”地位的变化，就是典型的边缘化过程。中部地区的边缘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因素导致我国区域间的传统分工发生变化，而出现的新现象。中部地区这一边缘化过程，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决定，但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边缘化的问题表现得尤其明显。

因为中部塌陷发生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我们在寻求中部崛起的途径时，就必须在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寻找到自己科学合理的定位。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在全球化的生产分工体系中被日益边缘化，沿海等优势区位地区对内地实现了产业替代和就业替代。而以出口导向和政府投资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模式，则进一步制约了中部地区的发展空间。中部地区塌陷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政策和主观造成，而是全球化经济规律使然。

既然中部塌陷是全球化作用的必然结果，又受到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约束，是否意味着中部地区只能接受中部塌陷这样一个宿命的结果呢？中部崛起到底是一厢情愿式的空想，还是有科学依据的目标？政策是万能的吗？我们还能用深圳和浦东模式来发

展中部吗？中部崛起的内涵和标志是什么？怎样看待中部地区的现状？怎样判断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中部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促进中部的崛起？

我们的分析在全球化下的边缘化及外向经济为主抑制内需的增长方式这一基本解释框架下展开。我们认为，全球化下的区域边缘化理论并不意味着中部地区的宿命结局，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日趋均衡，具有国内市场优势区位的中部地区正面临重要的政策机遇和经济窗口。中部地区既不要气馁，也不要不切实际提出过高的要求。赶超战略固然诱人，但经济规律不能违背，应练好内功，理顺机制，打好基础，培育优势，深化观念变革、加速转换政府职能，加快培育民间经济主体。通过发现并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价值，来重振中部雄风，再造中部辉煌。否则，我们可能有如盲人摸象，难以找到合理的路径和关键的突破口，在仓促急躁中重复中部塌陷的恶性循环。我们认为，中部崛起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建立比较优势的传统增长模式和发挥创新优势的新经济增长模式的结合。政策因素最后将逊位于“看不见的手”，中部地区发展主要靠经济规律，但宏观经济政策对区域发展的调整、特别是对全球化的区域负效应的矫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部地区的边缘化

中部五省（湖北、河南、湖南、安徽、江西）地处祖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的作用，依靠全国 9.06% 的土地，承载全国 25.5% 的人口（2002 年），创造全国 20.52% 的 GDP（2002 年），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化及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进程中，尽管我国社会经济整体水平取得了快速发展，不过由于发展起点和环境、条件不同，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凭改革开放先发效应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区域；二是随着 2000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省份的经济开始迅速起步；三是同属广义中部地区的东北地区也抓住“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难得机遇，努力实现经济的突破性进展，以湖北、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份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则面临中部塌陷的困境。

2.1 中部塌陷的现实

中部地区曾经有过辉煌过去，以武汉等特大城市为代表的中部地区曾经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封闭发展的条件下，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的显现，其

在地区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加强。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得对外开放之利,其区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以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迅速,并形成对内地国有部门和传统工业地区的刚性就业替代。内需不足,使得中部地区面向国内市场的区位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同时,机制、观念的僵化,妨碍了改革的动力和创新的想象力以及中部地区的发展。此外,政策的“洼地效应”,也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导向机制和宏观环境。

2.1.1 经济增长东快西次中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市场开放程度扩大以及经济结构的变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9~1999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6%,人均GDP年均增长8.2%。在20年的时间内经济能保持这样高的平均增长速度,这在世界上都是不多见的。然而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却在不断拉大。1978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52.6%,是中部地区31.1%的1.69倍,西部地区16.3%的3.23倍。到1990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提高到53.78%,相当于中部地区的1.8倍和西部地区的3.3倍,但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相对缩小,中部地区GDP与西部地区GDP的比例由1985年的1.92降为1990年的1.84。1991年后随着我国利用外资的高速增长,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总体上继续拉大。从表2-1可见,东部地区GDP增长速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全国GDP总额中的比重由1991年的55.09%提高到2001年的59.59%,东部GDP与中部和西部GDP的比率也由1991年的1.92和3.40提高到2001年的2.35和3.97。

表 2-1 1991~2001 年三大地区 GDP 结构及其差距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0	2001
东部 (%)	55.09	57.89	58.26	57.80	56.80	59.40	59.59
中部 (%)	28.70	27.23	27.59	28.19	28.88	25.58	25.41
西部 (%)	16.21	14.88	14.15	14.01	14.32	15.02	15.00
东部/中部	1.92	2.13	2.11	2.05	1.97	2.32	2.35
东部/西部	3.40	3.89	4.12	4.13	3.97	3.95	3.97
中部/西部	1.77	1.83	1.95	2.01	2.02	1.70	1.69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整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一直是东快西慢中部居中的态势。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地区发展差距缩小。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力量。西部地区经济“亮点”不断生成，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2000 年，东部地区经济启动快、增幅大，增长率平均为 10.3%。全国 31 个省（市、区）中增幅超过 10% 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西部（不含西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率达到 8.5%。与 1999 年相比，中部提高了 0.9 个百分点，西部却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中部与西部的差距缩小。

2001 年，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仍保留在 10% 以上。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低于 10% 的只有河北（8.7%）、辽宁（9%）、福建（9%）和广东（9.3%）4 省。而中部没有一个省份的增长速度超过 10%。西部却有 2 个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 10%，这 2 个地区为西藏（12.6%）和宁夏（10.1%）。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分别为 10.03%、9.16% 和 8.84%，东部比中部高 0.87 个百分点，比西部高 1.19 个百分点。

2002 年全国各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表明，我国以往东快西慢中部居中的经济增长基本格局已被打破，经济发展呈现

出东部最快、西部居中、中部较慢的增长态势。东部、中部和西部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0.92%、8.53% 和 9.04%。东部各省(市)对全国经济增长继续起着领跑作用,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前 10 个省(市、区)中,有天津(12.5%)、浙江(12.3%)、江苏(11.6%)、山东(11.6%)、上海(10.9%)和广东(10.8%)等 6 省(市)。2002 年西部 GDP 增长快于中部 0.51 个百分点,这是近年罕见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前 10 个省(市、区)中有 3 个西部省(区),分别是青海(12.4%)、内蒙古(12.1%)和四川(10.6%),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取得明显成效。中部经济增长较为缓慢,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前 10 个省(市、区)中,只有山西(10.8%)1 个省(周绍森等, 2003)。中部经济增长减慢,一方面是由于中部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竞争不过东部地区,在政策上与西部相比不占优势,因而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是中部地区内在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仍停留在较多依靠国家支持阶段,市场活力不足制约其快速发展。

2.1.2 人均 GDP 差距拉大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充分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1990 年代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见表 2-2)。1990~2001 年东部地区人均 GDP 增长了 5 倍,中部地区人均 GDP 增长了 4 倍多,西部地区人均 GDP 增长了近 4 倍。与 GDP 总量的变化趋势类似的是,1990 年以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 GDP 的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东部地区人均 GDP 与中部地区人均 GDP 的比率由 1990 年的 1.83 上升到 2001 年的 2.18;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 GDP 的比率分别由 1990 年的 2.07 和 1.13 逐年递增到 2001 年的 2.75 和 1.26。

表 2-2 1990~2001 年三大地区人均 GDP 及差距 (单位: 元)

	1990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0	2001
全国	1634	1879	2939	4854	6054	6546	7084	7543
东部	2433	2859	4953	7802	10673	12328	13105	13832
中部	1329	1447	2265	3797	5077	5581	5933	6316
西部	1117	1347	2038	3012	3877	4406	4705	5026
东部/中部	1.83	1.98	2.19	2.05	2.1	2.21	2.21	2.18
东部/西部	2.07	2.12	2.43	2.59	2.75	2.8	2.79	2.75
中部/西部	1.13	1.07	1.11	1.26	1.31	1.27	1.26	1.26

资料来源: 根据 1990~200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计算

2.1.3 固定资产投资西部高于中部

“八五”以来,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呈现由东向西依次递增的势头, 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幅度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为本世纪开发西部地区打下了基础。

2000 年,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 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 基础设施状况继续改善。东部和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别为 19135.75 亿元和 7481.02 亿元, 比 1999 年增长 8.96% 和 11.42%; 西部地区 (不含西藏) 投资 6145 亿元, 增长 12.95%, 分别高于东部和中部 3.99 个百分点和 1.53 个百分点。

2001 年,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11.34%、9.6% 和 16%。中部地区增长率低于东部地区 1.74 个百分点; 大大低于西部地区, 差额为 6.4 个百分点。

2002 年, 三大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有所提高。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 15.7%、18.15% 和 20%。东部地区市场因素带动投资增长加快，西部地区政策性因素作用投资增长较快，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但相比之下，中部地区投资增长率仍低于西部。

2.1.4 消费潜力中部低于东西部

2002 年，东部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月消费支出低于西部地区，但略高于中部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月消费支出均呈现出西部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的运行格局。最值得关注的是，西部居民消费倾向（消费与收入之比）比较高，居三大地区首位。根据计算，2002 年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含西藏）三大地区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为 77.4、76.7 和 81.5，西部地区居民分别比东部、中部高 4.1 和 4.8 个百分点。

2.1.5 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突出

从产业结构看，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结构性矛盾突出。总体上看，中部地区一、二、三次产业的发展与东部地区都存在较大差距。从所有制改革看，当前，中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仍然偏高。对全国国有及非国有以上国有工业进行统计，中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然偏高，为 68.22%，为东部地区 39.75% 的 1.72 倍，而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同东部地区差距较大（黄速建等，2001）。这表明，中部地区体制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尚未得到释放。从人口结构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看。2001 年，中部五省农村人口占五省总人口的比重高达 78.2%，是全国农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五省农业劳均耕地仅为 4.2

亩，明显低于东部、西部、东北三省和全国。这使中部五省成为全国剩余劳动力最多的地区。要达到起码的经济规模劳均 8 亩，就需要转移剩余劳动力 4756 万，占五省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一半，占全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 59%。作为老农业基地，中部五省在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广大农民群众也承受了巨大牺牲，五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国水平。与西部相比，虽然收入水平略高，但中部五省农民的税费负担明显高于西部。2001 年，五省农业劳动力人均负担涉农税比西部高出 21%，耕地亩均税负更高出西部、东部和东北三省 11 元、1.1 元、14 元。加上老粮棉基地财政挂账的巨大包袱，中部五省农民苦、农村穷、财政弱的问题十分普遍（梁亚莉，2003）。

2.1.6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缓慢

在工业化方面，从经济结构看，一产业比重过高，三产业未能快速增长。2002 年，中部五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构成为 19.30 : 44.82 : 35.88。从第一产业看，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38%）近 4 个百分点，更是长江三角洲的 2.4 倍。从第二产业看，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1.09%）6.27 个百分点。从第三产业看，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3.53%）2.35 个百分点，但远低于长江三角洲（41.27%）。可以说，与长江三角洲已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进发相比，中部五省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

从城市化进程方面分析，中部五省是中国农村人口集中、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部五省农业人口比例为 7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3.91%）；但与长江三角洲相比，只相当于其城镇化水平的 58.56%，农业劳动力转移压力大。2002 年，全国平均每 194.62 万人拥有一座城市，而中部五省平均每 224.59 万人拥有一座城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长江三角洲水平（平均每 184.5 万人拥有一座城市）。